

# 萧友梅先生传略

廖 辅 叔

（先生名友梅，字思鹤，又字雪朋，据他在德文证书上正式姓名的拼音，雪朋写作Chopin，当是出于对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仰慕。可见是在他留学日本，有了相当的欧洲音乐知识之后才会这样取名的。肖邦痛心波兰的亡国，终老巴黎，不甘心屈居于沙皇俄国的暴政之下，这与当时青年学生不满意清廷的专制统治，感情上是相通的。他生于一八八四年一月七日，原籍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童年跟随父亲寓居澳门，读书是进的私塾，澳门颇有名气的灌根草堂。老师名陈子囊，是一位严肃的读书人。他旧学之所以有相当的根底，无疑是应归功于这一段时间的学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决定他终身事业的最初的音乐经历却是来自他家隔壁的一个葡萄牙牧师。这个牧师家中有一台风琴，引起了这个儿童对西洋音乐的兴趣。他自己后来说，他听了风琴演奏之后，“羡慕不已，然未有机会学习也”。①

（一八九八年，广州第一所洋学堂时敏学堂开始招生，他即返广州报名入学。时敏学堂的课目有国文、历史、地理、格致、算学、图画、唱歌、体操等等，却没有做官捷径的“八股制艺”。如果联系到当时北京京师大学堂的课堂设置依然是诗、书、礼、易四堂及春秋二堂，并没有摆脱旧式书院的格局，那么，时敏学堂真应该算是走在时代前头的洋学堂了。②一九〇一年时敏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十人在堂长（校长）邓家仁率领之下远赴日本留学，萧友梅可能也是这批留学生之一。

萧友梅留日期间，先是在东京音乐学校



唱歌科毕业，后又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育系，并在东京音乐学校专修钢琴。他是自费留学生，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因此他经常担任留学生翻译工作，借以获得一些生活费用的补助。原来当时的“清国”留学生有许多是不懂日语的，上课的时候需要有人跟班翻译，这也可以算是中国留学史上的轶闻吧。

一九〇九年他在帝国大学毕业，随应清政府在东京举行的留学生毕业考试“中式”文科举人。在此之前（一九〇六年），他已经由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由于他那音乐学生的身份，政治色彩比较淡薄，不会引起警探的注意。他的住处因此成为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集会的地方。后来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越来越积极，影响也越来越广泛，清政府于是下令通辑“孙文”，派出密探在东京侦查孙中山的行动，并通过日本政府协力查拿。孙中山这时真是步步荆棘，最后是躲藏在萧友梅的卧室，饮食生活全由萧友梅包下来，同时由萧担任与外间革命活动的联系。这样过了一个月才转移到安全地点。萧先生这种为革命甘担风险的精神，极受孙中山的赞赏。

一九一〇年萧友梅学成返国，任北京学

部（教育部）视学，取得了掩护革命的合法身份。一年之后就爆发了敲响大清帝国丧钟的武昌起义。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萧友梅做了总统府秘书。孙中山辞职之后，萧回广东任广东省教育司（教育所）学校科科长。当时的司长是钟荣光。比较新的措施有提倡男女同学、体育、军国民教育等等。是年十月，萧友梅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发出的官费留学的通知，再一次出国留学，而且是去德国。）

日本音乐教育是以德国为蓝本的。萧友梅本不以留学日本为满足，这次他决定去德国留学，才算是达到了探本溯源的目的。（既然他是以音乐为主科，目的也就选定了莱比锡，因为莱比锡有门德尔松创办、舒曼夫妇任教的音乐学院和布帛馆音乐会。他在莱比锡也象在东京一样，同时兼读两个学校：莱比锡音乐学院和莱比锡大学。）当时在两校任教的有当时德国的乐坛泰斗里曼、谢林等等。（一九一六年春，莱比锡音乐学院课程修毕。随向莱比锡大学提出博士论文《中国古代乐器考》。）七月，大学通过授予哲学博士学位、主持口试的是里曼。（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交通阻断。他既不能返国，于是再到柏林大学听课，课目真是包罗万象，计有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音乐美学，并参加音乐学课堂讨论。但他还不满足，再进柏林施特恩音乐学院<sup>⑨</sup>研究作曲、配器、指挥及古谱读法。一九二〇年才终于登上返国的航程。）

（返国之初，他任北京教育部编审员，兼任高等师范学校附设实验小学主任。一九二一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他为北京大学讲师。他的主要工作是扩大原有的音乐研究所的规模，改为音乐传习所，主讲和声学及音乐史，同时组织管弦乐队，自任指挥，面向社会。中国第一次有了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粗具规模的管弦乐队，介绍了西洋的

古典音乐。他根据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歌》的描述探索霓裳羽衣舞的结构写成一首器乐曲《新霓裳羽衣舞》即由这个乐队首次演出。）

（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接受章太炎的建议，采用古歌《卿云歌》作为国歌歌词，征求曲谱。评选结果，萧氏的作品获得国务院的通过定为正式的国歌。）在此两三年间，为了适应教学的需要，他陆续写了不少配有钢琴伴奏的歌曲，编集成书的有《今乐初集》及《新歌初集》两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歌曲的先河。）

（在他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担任北京大学讲师的同时，他还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北京女子大学音乐科主任。一九二六年起又兼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原先是音乐与体育合为一科的，经他提议，音乐与体育才分为两种，音乐教育从此才比较带有专业性质。先是一九二〇年年底他已经向北京教育部提出创办独立的音乐学院的建议，可是他虽然一次又一次提出建校计划，却始终未被采纳。直到一九二七年，由于得到那位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蔡元培先生的支持，才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第一个音乐院在上海诞生了。）

音乐院成立之初，由蔡先生兼任院长，萧先生是教授兼教务主任，事实上一切行政事务也由他承担起来。他要用每月区区三千元（一年后加为五千元）的经费办尽可能多的事情。经过他苦心经营，学校总算站稳了脚跟。先是音乐院成立不久，蔡元培即任萧为代理院长，明年暑假正式聘任，但他谦让不就。一九二九年六月，忽然发生了一次风潮。起因是学校宣布，学生暑假留校住宿一律要交八元宿杂费，引起了家在外地，暑假主要住校的学生的反对，于是学生会决定罢课。本来这样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不幸的是有人希望风潮闹大，闹到学生跑到南京去

请愿，以便趁机把萧友梅赶下台，结果弄到萧友梅辞职，音乐院停办。恰巧是年八月南京教育部公布《专科学校组织法》，依照这个组织法的规定，上海音乐院和杭州艺术院都要改为专科学校。这样一来，原音乐院的学生要凭音乐专科学校所发的开学通知书才可以来校注册。没有收到通知书的“闹事”学生就等于被开除了学籍。萧友梅受聘为音乐专科学校的校长。

改组后的音乐专科学校比大学降低了一级，与《专科学校组织法》所列举的为陶业、制革、会计、保险、税务等等专业一样只是单纯传授一般技术的专科学校。当时杭州与上海的音乐院都坚持艺术是一门需要刻苦钻研的学问，决不同于传授一般技术的学校，要求改称学院，但是没有成功。这时黄自己已经自美国学成归来，萧氏当即聘他为教务主任。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教学水平迅速提高。学生除了在校内经常举行汇报性演出之外，还定期假座公共礼堂举行比较大型的音乐会，受到社会的好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查哈罗夫在一次校庆宴会上的发言。查哈罗夫原任彼得格勒音乐学院钢琴教授，后来同他的夫人、小提琴家汉森出国演奏。在上海开过音乐会之后，汉森继续她的演奏旅行，他却留住上海，并受聘为音专高级钢琴教授。他在那次宴会上说，当萧先生找他来校任教的时候，他曾不客气地说，中国音乐学生好比刚刚出生的小孩，用得着他去教他们吗？可是上课不久，他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断言：“中国学生很有才能，这样的学生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我愉快地承认我当初估计的错误”。

为了扩大影响，并为全校师生提供发表创作和研究心得的园地，萧先生与商务印书馆订约刊行《乐艺》季刊。音专丛书也在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音专师生群情愤激，萧友梅支持学生走出校门，进行

募捐宣传，出版抗日的歌曲专刊，举行鼓舞敌忾的音乐会，他本人也谱写了抗日歌曲。

针对当时国内音乐师资缺乏的情况，音专特别设立师范科。事实上许多学生没有等到毕业就已经在外面担任教师。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大城市与内地生活条件的差别是很大的。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意到内地工作。他因此通过教育部发函到各省教育所，要他们保送学生若干人来音专上学，毕业后仍回原地方工作，以便发展边远地区的音乐教育。这在旧中国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创举。

他的办学方针，遵循蔡元培的“仿世界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sup>④</sup>但是总的来说，他的思想还是倾向保守的。他所要求的是艺术上相对的独立性。“九·一八”以后，蒋介石借口“国难”，派遣军训教官进入各大学，以便加强对学校的法西斯统治。萧友梅面对这一反动措施，曾经进行过微弱的抵抗，请求南京教育部调走军训教官，企图保持音专的“清静”。但是这样的请求并没有结果，只是说明他是太过书生气而已。

音专的课程主要是西洋音乐，民族音乐只有琵琶、笙、笛、二胡等等。但是萧友梅的本意并不是全盘西化，他反对的是民族音乐的因循守旧。他刚从德国回来，即参加国乐改进社的工作。他评论音乐作品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是看它是否“适合于中国人的耳朵”。这句话曾经引起音专当时一些洋教师的反感。他们强调音乐是国际语言，何必管它适合不适合于中国人的耳朵。但是他始终坚持他的主张，他要求中国人的音乐作品必须有中国风味，他非常赞赏丁西林和赵元任的笛子改革。至于他心目中的所谓“国乐”，主要之点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他认为构成音乐的因素有三，第一是内容，第二是形式，第三是演出。音乐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懂得如何将其精神、思想与情绪通过

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要从传统的及民间的音乐收集材料，作为创作的基础<sup>⑥</sup>。他还曾向南京政府提议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乐器制造工业。结果又好比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一九三六年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麿（当时日本侵华首相近卫文麿的弟弟）来上海指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并来音专访问。为了表示“亲善”，他说回国之后，要赠送一架钢琴给音专。过了不久，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来信通知音专，说近卫秀麿的钢琴已经运到上海，请音专派人商谈交接事宜。萧友梅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

从音乐院到音乐专科学校不到五年的时间差不多年年要搬一次家。自己没有校舍，南京政府答应建筑费一直拖延不发。萧友梅没有办法，只好向社会募捐，东求西讨，只弄到一万元多一点，直到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才批准了五万元建筑费，而且是分十个月发给的，但是总算有了着落了，于是在江湾买了地皮，造起了自己的校舍。但是历年之后，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江湾新校舍即陷入炮火之中，于是又搬到法租界继续上课。十一月，上海沦为孤岛。萧友梅曾于一九三八年夏天亲去武汉国民党政府临时所在地，要求音专内迁，结果是空跑一趟，他只好返回上海。一九四〇年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组织伪政府之后，上海环境更加险恶，汪精卫妄想拉他下水。他虽然贫病交迫，始终不受奸人的勾引，维护着那风雨飘摇的音专，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一九四〇年深秋，他忽患感冒，体温时高时低，身体非常衰弱，不得不住进医院。

医院是属于低廉的那一级，他的住房又属于医院中低廉的一级。只要有人来看他，他就絮絮叨叨地询问学校的事情。死前两天他还担心钢琴课室朝外的门缝会吹进冷风，影响学生的弹琴，吩咐探病的人回去用硬纸条把门缝塞紧，堵住冷风。据萧师母说，这是他的最后的遗言，到了第二天深夜，他的病情突然恶化，延至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凌晨，这位辛勤创业的音乐教育家在熹微的阳光中停止了心脏的跳动。

他的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之外，还有《普通乐学》、《和声学》、《曲体学》及唱歌、钢琴、风琴、小提琴教科书。单篇印行的则有合唱曲《春江花月夜》、歌曲《杨花》、大提琴曲《秋思》等。

注 ①自书履历手稿。

②慕容业：《羊城话旧·最早的学堂一时敏学堂》，稿存广东省文史馆，待刊。

③施特恩音乐学院，一八五〇年施特恩与库列克及马尔克斯联合创办。初名“歌唱、钢琴、作曲音乐学校”。一八五二年改名音乐院。一八五七年以后施特恩单独领导该校，改名为“施特恩音乐学院”。它是柏林保存到今天的第一所音乐学院。一九三六年改名“首都音乐院”，一九四五年起称为“柏林市立音乐院”。

④《蔡元培选集》179页，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

⑤鸿倪：《萧友梅先生五年祭》，《文章》杂志创刊号，一九四六年一月出版。

（上接第13页）

的到来，文化建设高潮的兴起势所必然。我院将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修订教学计划，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健全教学制度。尽快培养出我国新的、具有世界水平的音乐人材和一大批杰出的音乐工作者，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更是我们音乐院校的责任。我们学校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历程，光辉的前景在前头，我们要同心同德地向着既定目标奋进。